

殖民地與革命文化霸權：香港與四十年代後期的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

葉漢明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蔡寶瓊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

從國共內戰前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的一段時期內，香港曾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後期的發展，尤其是在文化戰線方面，發揮過一定作用。在這個意義上，香港可說是中國革命的後勤基地。當時國民黨在國內加強鎮壓左翼文化活動，大批民主人士、左派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中共地下黨員等被迫潛走南下，集於香江。來自北面的鎮壓力量，以及殖民地的微妙政治生態環境，使他們凝聚一起。在這個特殊的時空內，革命分子利用辦報刊、出版、印刷、辦學、組織社群統戰活動等文化手段，迅速發展文化戰線上的工作。一方面繼續攻擊國民黨，並展開對中間力量的批判；另一方面致力於對民主派進行統戰工作，並進一步使這些黨派革命化，以擴大及整合陣營。在這方面，中共可說在爭取文化領導權的路上又邁進了一大步。

對這方面的分析，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理論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簡單來說，所謂文化霸權，指的是以被領導者的同意為基礎的政治領導權。領導者須將其世界觀普及化，以取得社會主要團體的認同。¹基於這種觀念上的認同所建立的政治領導權就是文化霸權。Gramsci強調政治文化的道德性及文化和思想意識在政治領導權方面的首要地位，認為文化霸權是奪權和執政的條

* 本研究計劃曾受UPGC Direct Research Grant資助，謹此致謝。我們也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人的專業意見，尤其在肯定有關概念的適切性方面對筆者所予的支持和啟迪。

¹ T. R. Bates, "Gramsci and the Theory of Hegemon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6:2 (1975), p. 352; R. Bocoock, *Hegemony* (New York: Tavistock, 1986), p. 11.

件。² 只有當一個階級在它奪取國家權力之前就享有文化霸權，它才能建立完全的國家。這一切都意味著廣泛普遍的同意。³ 故他說：

一個社會集團能夠而且確須在贏得政權前就行使了「領導權」(這確是贏得這種權力的主要條件之一)。當它爾後行使權力時，就成了統治者；但即使它牢牢地掌握著權力，也必須繼續「領導」。⁴

不少學者已說明 Gramsci 在建構文化霸權概念方面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貢獻，指出他發展了從普列漢諾夫 (Plekhanov) 到列寧 (Lenin) 等俄國革命理論家為扭轉馬克思主義陣營中過分強調經濟決定論的傾向而提出的重視「上層建築」的說法。⁵ 有學者甚至認為，Gramsci 的文化霸權概念是十九世紀馬克思主義與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分水嶺。⁶ 另一方面，也有少數學者注意到中國和古巴等第三世界在革命中所建立的文化霸權，以及中共和毛澤東在「民主集中制」方面的實踐。⁷ 如果從比較史的角度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毛澤東對意識形態和文化統戰工作的重視，實與 Gramsci 對文化霸權概念的強調有一定的可比性。他們不約而同的認識是二十世紀世界共產主義比較史的好題材。事實上，中共在與國民黨鬥爭的過程中，一直非常重視文化戰線，稱之為「第二條戰線」，與軍事戰線並重。如果說，文化戰線上的工作能形成統一性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的核心就是革命，我們或可稱之為「革命文化」。毛澤東在 1940 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就已指出革命文化的重要性。他將共產黨所要建立的新文化稱為「革命文化」，並說：

革命文化，對於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路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路線。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這個文化戰線上的各級指揮員。「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⁸

²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 Hoare and G. N. Smith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pp. 53, 57-58, 161, 275, 333, 350.

³ A. S. Sassoon, "Passive R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Approaches to Gramsci*, edited by A. S. Sassoon (London: Writers and Readers, 1982), p. 141.

⁴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p. 57-58; 很明顯，這裏所說的領導權，指的是文化領導權。

⁵ Bates, "Gramsci and the Theory of Hegemony," pp. 351-66; G. A. Williams, "The Concept of 'Egemonia' in the Thought of Antonio Gramsci: Some Notes on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1 (1960), pp. 586-99.

⁶ Bates, "Gramsci and the Theory of Hegemony," p. 353.

⁷ Bocock, *Hegemony*, "Conclusion"; J. Joll, *Gramsci* (Glasgow: Fontana, 1977), chap. 9.

⁸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載《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頁668。

毛把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相提並論，認為「武裝隊伍」與「文化隊伍」同樣重要。如果 Gramsci 注重政治文化的道德性及文化和思想意識在政治領導權方面的首要地位，毛澤東和中共則強調與軍事戰線並重的文化戰線上的革命，以及革命文化的建構。我們在四十年代後期的香港所看到的，就是中共利用香港的特殊時空在當時的南下人士及其外圍力量中建立「革命文化霸權」，為國內的奪權工作爭取支持的種種活動。

二

四十年代末香港的政治生態曾為各方面的力量提供了一個暫時共存並取得一定平衡的自由空間。相對於國民黨不斷排斥和鎮壓共產黨和民主人士的中國內地而言，香港稱得上是個自由世界。為顯其「民主風度」，香港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容許市民在宣傳上和某些社會運動上有一定程度的自由。⁹ 例如，它取消新聞檢查制度，容許不同政治立場的報刊出版，只要不直接損害英帝國的利益，又不觸犯法規就可以。示威遊行雖受警察監督，但集會限制較少。¹⁰ 在這個相對自由的地方，由內地南下的各派人士得以微妙地共處，港英當局也盡量在他們之間保持中立。除了在政治上比較自由之外，香港也是一個較大陸更開放及多元化的社會，這給中共的統戰工作提供了一個頗為有利的客觀條件。¹¹

中共就是在這段特殊的時間內，利用香港這個特殊的空間，進行其對敵作隱蔽鬥爭和對中間人士作統戰工作的活動。其實，早在抗日戰爭初期，周恩來已有在香港建立文化基地的構想，並提出「香港這塊地方我們不能丟」的戰略性指示。¹² 1937 年底，周氏徵得英國駐華大使的同意，在香港建立八路軍辦事處，並派廖承志到港負責籌建事務及主持統戰工作。¹³ 在廖氏領導下，文化界開展了各種宣傳及組織工作。在電影界方面，由上海來港的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有蔡楚生、司徒慧敏、譚友六等，其中蔡楚生為中共地下黨電影小組領導的中國電影文化協會執行委員。¹⁴

⁹ 《華南黨組織檔案選編(1945年-1949年)》(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82年)，頁17。

¹⁰ 余繩武、劉蜀永：《20世紀的香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頁166-67；趙元浩：〈宣傳與統戰相輔相成——辦《華商報》的一些體會〉，載南方日報社、廣東華商報史學會(合編)：《華商報之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47，111。

¹¹ 蔡榮芳對淪陷前香港的描述，也頗適用於戰後光復的香港。見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五章。

¹² 袁小倫：〈中國共產黨與省港抗戰文化活動〉，《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頁205。

¹³ 連貫：〈回憶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廣東黨史資料》第18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30-37；梁上苑：〈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建立內情〉，載魯言等：《香港掌故》第12集(香港：廣角鏡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頁62-75。

¹⁴ 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年)，第2卷，頁77；第1卷，頁171-99。

在文藝界方面，抗戰開始後宣揚愛國思想的文藝通訊組織在上海、武漢和廣州等地成立。這些城市相繼淪陷後，當地的進步文人紛紛南下香港，令香港的文藝通訊活動活躍起來。1939年6月，中華全國文藝抗敵協會香港分會成立，其下的「文藝通訊部」(簡稱「文通」)又於同年8月成立，在中共領導下工作。「文通」的地下黨員在上級黨組織的安排下成立黨小組。1940年5月後，又在黨小組的基礎上成立黨支部，負責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工作。¹⁵

1940至1941年間，「香港青年文藝研究社」(簡稱「文研」)成立並展開活動，它也由中共黨組織直接領導，為「文通」的姊妹團體。在1939至1941年兩年間，「文通」和「文研」除舉辦數次公開文藝競賽、在各報副刊中開闢出版園地、辦刊物等之外，還開展批判「新式風花雪月」的論戰，為聲援新四軍和批評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而組織抗議簽名運動，又抗議港英逮捕「文通」會員彭耀芬等。¹⁶

中共也在新聞界中建立了基地。1939年，范長江和胡愈之創辦的桂林國際新聞社在香港設立分社，成為中共領導的宣傳機關。¹⁷由共產黨領導的新聞界統戰機構中國新聞記者學會就在這年成立香港分會，吸引了不少香港報業同行參加。¹⁸該會又辦了一所中國新聞學院，招收高中畢業生。由1939年4月5日至1941年淪陷之前，共辦了三屆，畢業生百餘。¹⁹該院也成立中新通訊社，為學院同學提供實習的機會。他們在資深黨員或進步新聞工作者的指導下做採訪、發稿等工作。²⁰

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後，周恩來致電廖承志，說要「在香港建立我們自己的宣傳據點」。²¹中共南方局遂把國統區，包括桂林、重慶的左派文人疏散到香港，由黨

¹⁵ 文通學社(編)：《歷史的軌跡，1939-1950》(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3。

¹⁶ 同上注，頁3-10。

¹⁷ 劉思慕：〈回憶和感想〉，載廣州、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校友會籌備會(編)：《歷史、話舊、懷念——香港中國新聞學院紀念文集》(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4年)，頁39-42。據另一說法，1939年，胡愈之主持的香港國際新聞社與范長江及胡本人創辦的桂林國際新聞社合併，成為中共領導的宣傳機關國際新聞社，見高天：〈戰鬥到生命最後一息〉，載南方日報社、廣東《華商報》史學會(合編)：《華商報之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89-90。

¹⁸ 劉思慕：〈回憶和感想〉，頁39-42；林煥平：〈關於香港中國新聞學院〉，載《歷史、話舊、懷念》，頁45-46。

¹⁹ 見《歷史、話舊、懷念》一書中以下各文：林煥平：〈關於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頁45-46；盧豫冬：〈難忘的新聞學府——憶香港中國新聞學院〉，頁47-50；〈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主辦中國新聞學院招生簡章〉，頁5。

²⁰ 見《歷史、話舊、懷念》一書中以下各文：葉廣良：〈中新工作回憶〉，頁51-52；胡漢輝：〈四十年後話中新〉，頁53-55；顏思回：〈回憶中新和郭院長〉，頁59；余子莊：〈中新之憶〉，頁71-72。

²¹ 張友漁：〈我和《華商報》〉，載南方日報社、廣東《華商報》史學會(合編)：《白首記者話》(下轉頁195)

員做這方面的工作。如夏衍和張友漁，就在廖承志的領導下工作。據夏衍說，到了1941年6月，香港的宣傳基地已基本建成，包括：《華商報》、《大眾生活》、《筆談》、《文藝陣地》、《耕耘》、《世界知識》、《青年知識》、《大地畫報》和其他畫家園地等。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也成立了，周恩來在香港建立文化基地的構想遂成為事實。

透過各種文化活動，左派分子滲入不少青年組織中。據1939年10月一份黨內文件記載，當時香港和澳門是「特殊後方學運根據地，那邊的青運可以說完全以學運姿態出現。……他們的工作是有基礎的」。這份報告列舉香港的青年運動團體，包括學脈會、惠陽青年會、青年同樂社、南風社和娛嫻樂社等。²²其實，在此之前，國民政府已留意到中共在香港開展的青年思想工作。一份政府密令指出，香港「人民陣線分子」於1937年7月成立文化研究會，發起組織華南文化界聯合會，做教育、藝術及新聞界等的工作，同時又進行世界語文運動，包括世界語、新文學等項目。另一方面，全國文化救國會華南總會區會召開代表大會，議決變更工作方式。從前以救國會名義辦的活動，改由該會分子滲入其他組織，在背後進行。據聞這種新方法已發生作用。8月份香港基督教團體發起，在虎豹別墅舉行全港學生春令會。節目除主日崇拜、禮禱和靈修外，還有民眾歌詠和問題討論，主題為「中國學生思想動向」，這項活動就是由救國會所領導的。發文者呼籲各部小心防範這種活動手法。²³

此外，在香港的中共地下黨員亦發動愛國青年組織成立各種救亡工作團，以支援國內抗戰。1939年初，大批來自香港、澳門的黨員和積極分子，加上從南洋回來的華僑青年，成立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是為日後著名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簡稱東縱)的基本隊伍和主要骨幹。東縱在香港淪陷期間，保護避難到港的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被俘的盟國軍政人員的功績，為後來國共內戰期間中共在香港的統戰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²⁴

中共重視文化戰線工作的傳統並未因抗戰而中斷，他們一方面在國內堅持邊作戰邊做統戰工作，另一方面以香港為文化基地，讓南下的電影界、文藝界、新聞界等文化統戰工作者有較安全的發展空間。皖南事變後，中共更以香港為宣傳據點，接收國統區的左派文人，展開與國民黨在「第二條戰線」上的鬥爭，以建立文化霸權。中共當時所建立的宣傳基地，雖隨著香港淪陷而消失，卻為日後國共內戰期間中共在香港的活動奠定了基礎。

〔上接頁194〕

華商：香港《華商報》創刊四十五周年紀念文集，1941—1986》(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8。

²² 〈廣東青年團體的工作報告〉，1939年，廣東省檔案館檔案。

²³ 〈廣東省第六區保安司令部密令〉(奉廣東省府、廣東綏靖主任公署函)，1937年8月14日，廣東省檔案館檔案。

²⁴ 東江縱隊史編寫組：《東江縱隊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4—26，60—65，115—23。

三

抗戰甫結束，廣東區黨委就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準備南方還有十年黑暗的艱苦鬥爭，和加強大城市工作」，於是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把城市工作分成兩個系統：一是以領導城市地下鬥爭為主要工作的秘密系統；一是以香港為中心進行對外宣傳和統戰工作的半公開系統。後者由連貫、饒彰風等負責。²⁵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也派員會同廣東區委所派的人員，在香港重新建立新聞傳播據點，²⁶ 先於1945年11月創辦了戰後在香港公開出版的第一家中共報紙《正報》，繼於1946年1月復刊《華商報》。²⁷ 內戰開始後，中共上海和南京的地下黨總司令部也轉移至香港，香港遂成滬、寧的「二線」。²⁸ 原在上海出版的《群眾》周刊也在1947年1月遷到香港。

1947年初，中共香港分局成立，直屬中共南方局，由周恩來親自指揮，下設香港工委，專責香港、華南及東南亞的統戰工作。²⁹ 香港工委下面設報委、文委、經委和群委，統領各方面的宣傳、組織和資金籌集等工作，十分全面。³⁰ 可見中共在港佔有文化陣地，開展文化陣線，以爭取文化領導權的周詳計劃。1946年底，當中共中央準備以香港為「第二線」指揮中心時，周恩來對來上海匯報工作的廣東區委兼區統戰部長連貫說：「民主人士、文化藝術界人士，還有些幹部都要轉移香港等地，香港要準備接受這項任務，……這些人中，能教書的教書，能辦報的辦報，……」³¹ 可見教書、辦報等文化手段，既能掩護來港工作的知識分子幹部，又能安置南下避難的文化界民主人士。更何況這些工作能發揮對敵人作抨擊，對友好及廣大人民作統戰宣傳，以爭取文化領導權的作用。因此，1945-1946年間中共在香港設立不少文化機構，包括報社、雜誌社、出版社、印刷公司、學校等，並進行各種統戰活動，都是建立「文化霸權」的有效部署。其要項如下：

²⁵ 楊村：〈連貫簡傳〉，載《連貫同志紀念文集》編寫組：《賢者不朽》（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年），頁200；〈中共廣東區委廣東長期堅持鬥爭的工作佈置〉，載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等（編）：《中共廣東省組織史資料》第1輯，頁292，轉引自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粵港關係史，1840-1984》（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227。

²⁶ 周淑真：《1949飄搖港島》（北京：時事出版社，1996年），頁33。

²⁷ 〈兩年來的正報工作〉，廣東省檔案館檔案：革命歷史報告（1948年）；楊奇：〈復刊後的香港《華商報》〉，載《白首記者話華商》，頁13。

²⁸ 楊村：〈連貫簡傳〉，頁205-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694，697。

²⁹ 《華南黨組織檔案選編（1945年-1949年）》，頁48。

³⁰ 據訪問所得；關於香港分局的成立及其下面的組織，見周淑真：《1949飄搖港島》，頁30。

³¹ 見《賢者不朽》，頁205。

辦報

戰後第一張在香港辦起來的中共報紙，是廣東區黨委的機關報《正報》，1945年11月面世，為兩日報，由楊奇負責。楊奇原為東縱機關報《前進報》社長，戰後接受廣東區黨委的任務來香港辦報。同時，廣東區委宣傳部長、東縱秘書長饒彰風也帶領幹部來港，1945年10月間開始籌備《華商報》復刊。³² 該報於1946年1月4日正式復刊，總編輯為劉思慕，副編輯為廖沫沙。劉氏並非黨員，但在廣州時曾與地下黨員張鐵生、狄超白及民盟人士千家駒等辦過雜誌，而且曾在內地及南洋當過報紙編輯及主筆，所以由當時在港的張氏、狄氏等介紹與饒彰風。廖沫沙則為黨員，接受南方局周恩來和王若飛指示，1945年12月由重慶抵港，在《華商報》工作。³³ 另一份中共出版物為《群眾》週刊，1947年底出版，性質與報紙不同，為理論刊物。³⁴ 此外，還有黨員趙元浩聯合幾位報刊同業辦的《經濟導報》週刊，由1947年1月出版。³⁵ 抗戰時期已設立的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也恢復運作，由民盟人士劉尊棋、高天和黨員陸詒等負責，每天出英文的《遠東通訊》和中文新聞稿，發給各報館，專門宣傳中共政策。³⁶ 除此之外，也有其他規模較小的報刊，如喬冠華領導出版的英文半月刊《今日中國》、夏衍辦的半月刊《世界展望》、黨員陸詒主編的民盟機關報《光明報》等。³⁷

出版工作在各級黨的直接領導下進行。抗戰結束後，《華商報》和《正報》初期都由廣東區黨委領導。1947年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成立後，香港分局書記方方直接管《正報》，而工委下設報委，書記由工委書記章漢夫兼任，直接領導《群眾》和《華商報》的工作。³⁸

中共的辦報工作是多功能的，而最直接的作用，當然是思想政策宣傳，如《正報》草創時所接受的任務是「自己佔有陣地」，「在群眾中廣泛宣傳黨的政策主張」。³⁹ 《華

³² 〈兩年來的正報工作〉；楊奇：〈復刊後的香港《華商報》〉，頁13-18。

³³ 曾菀：〈回憶思慕在《華商報》〉，載《白首記者話華商》，頁34-36；廖沫沙：〈多少英雄硬骨頭——回憶饒彰風同志〉，載同書，頁21-24。

³⁴ 據香港工委委員之一夏衍回憶說，《群眾》冗長文章多，讀者頗有意見，認為「太高深」、「內容單調，不夠多樣，不夠活潑」，見夏衍：〈白頭記者話當年——記香港《華商報》〉，載《白首記者話華商》，頁7；周淑真：《1949飄搖港島》，頁35。

³⁵ 趙元浩：〈宣傳與統戰相輔相成〉，頁44-47，111。

³⁶ 據1992年7月28日訪問所得；韓辛茹：《陸詒》（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5年），頁54-55。

³⁷ 夏衍：〈白頭記者話當年〉，頁5；思慕：〈我進《華商報》的前後及其他〉，載《白首記者話華商》，頁29-33。

³⁸ 周淑真：《1949飄搖港島》，頁29；楊奇：〈復刊後的香港《華商報》〉，頁13；劉添梅、饒海珠：〈輝映猶在 業績尚存——記饒彰風與《華商報》〉，載《白首記者話華商》，頁25-28；又據訪問所得。

³⁹ 〈兩年來的正報工作〉。

商報》則擔負「向海外和國民黨統治區廣大人民正確闡述中共方針政策，如實報導國際國內形勢」的任務，其工作始於1947年2月國共談判破裂，中共機關撤出寧、滬、渝等地，以及3月中共中央撤出延安的時期。⁴⁰無可置疑，自1945年底至1947年初開始，中共即以香港為對海外及國民黨統治區宣傳的重要基地。

同時，中共委派到南洋做華僑統戰工作的人員，也負起為支援《華商報》及在港文化人生活的籌款任務，饒彰風也在此時到南洋籌款。⁴¹這些在南洋的籌募運動，同時也是爭取各階層華僑的支持、擴大影響的手段。

在香港，支持《華商報》的籌款運動分別在兩個層次進行。一個是通過個人關係向工商界籌集。另一個層次則是所謂「群眾救報運動」，用各種方法，例如「十元樂捐」、「贊助訂戶」等，直接向讀者募捐，在整個過程中，當然也同時有廣泛宣傳的效果。⁴²

其實，《華商報》在組織讀者方面一向做得出色。據曾任讀者版編輯的吳荻舟回憶，1948年內戰發展迅速時，讀者版的各種聯絡及組織工作十分忙碌，如用版面、覆信及面談方式回答各種有關中共號召、政策等的詢問；利用讀者版作中轉站，刊出讀者問題，徵求答案；如有「品質好、學習認真的讀者」，吳氏更登門拜訪，然後把這些讀者組成學習小組，加以輔導；遇有讀者主動組織學習小組及要求輔導時，讀者版負責人則安排「有專業知識的、有技術的讀者組織在一起學習政治理論和國內外形勢，提高他們的思想認識，準備有朝一日回解放區工作」。中共佔領廣州後，這些讀者都相繼回內地工作，有入黨的，也有擔任各種專業工作的，可見這種積極組織讀者的手法是有效的。⁴³

報刊的招募及組織工作，除以讀者為目標外，還以報界同行為對象。《華商報》內部領導指示，要與香港一些報界人士，包括《大公報》、《文匯報》、《星島》、《華僑日報》等的編輯展開聯誼活動，每週聚會一次，聽取如夏衍和金仲華等資深黨內或接近中共的報業人士的報告。據國際版編輯俞鯉庭的憶述，除了這些聚會外，「估計上層也在開展活動」。因此《大公報》和《文匯報》後期也起了變化，採用較同情中共的詞語。⁴⁴另外，《經濟導報》週刊也成立「香港經濟記者聯誼會」，作為經濟記者的統戰組織，每天「有計劃地分頭採訪，傍晚集中在《經濟導報》社交換新聞」，然後記者各

⁴⁰ 楊奇：〈復刊後的香港《華商報》〉，頁15。

⁴¹ 夏衍：〈白頭記者話當年〉，頁5；劉添梅、饒海珠：〈輝映猶在 業績尚存〉，頁27。

⁴² 思慕：〈我進《華商報》的前後及其他〉，頁32；莫廣智：〈《華商報》的廣告鬥爭〉，載《白首記者話華商》，頁92-94。

⁴³ 吳荻舟：〈版面內外——憶《華商報》讀者版的工作〉，載《白首記者話華商》，頁63-65。

⁴⁴ 俞鯉庭：〈難忘的三年半編輯生涯——憶復刊後《華商報》的片斷〉，載《白首記者話華商》，頁43-47。

自寫報導，這制度維持了兩年半之久。據當事人說，這方面統戰工作的收獲，是「各大報的經濟報導水平提高」，而「各報記者對國內經濟形勢的看法也達到了共識」。⁴⁵

《華商報》是中共對海外華僑及國民黨統治區宣傳的重要媒介，而因為國民黨政府嚴厲的言論查禁政策，該報也成為中共根據地外唯一有中共背景的報紙。它的主要發行地區，是廣州和華南游擊區、香港和南洋。國共還在進行和談的時候，該報雖然受到種種阻撓，但仍然能夠在廣州公開發行；和談破裂後就轉入地下，用種種隱蔽的手法運到內地；至於南洋，則通過華僑報社和書店發行，或直接郵寄予訂戶。⁴⁶ 其間，《華商報》也成為中共的半公開聯絡接待站。國民黨統治區和南洋的華僑青年或學者，希望到香港的「進步學校」就讀，或進入解放區工作的，都會直接要求報社協助，或通過與中共關係十分密切的民主黨派、個別「進步人士」等介紹到報社。此外，很多參加學生運動或其他社會運動的共產黨員、地下黨、學生或其他外圍人士，不能在國內立足，也是先到香港《華商報》找聯繫，而報社就會作隱蔽安排，伺機秘密把他們送到在中共控制下的地區。⁴⁷ 該報另一批工作對象，是海外僑領和僑團人士，以及從內地來港的「民主人士」，使他們增加對中共的同情和建立與黨的聯繫。例如，劉思慕以民盟成員身分作為報社總編輯，就多次聯絡在港的民主人士，做好對民主黨派的統戰工作。⁴⁸ 到國共內戰後期，部分想投向中共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更以《華商報》為聯絡站。⁴⁹

由中共的新聞統戰機關中國新聞記者協會所辦的「中國新聞學院」，在1941年香港淪陷時停辦，到了1946年5月，也隨著中共及民主黨派辦報基地的重建而復辦第四屆。第五屆於9月開辦，同時又增設函授班，招募海外及內地青年。至1947年3月第五屆畢業後，學院因院址問題停辦。但到了1948年10月，院長劉思慕決定重新開設「香港中國新聞函授學院」，大概只辦了一屆就停辦了。時國內形勢逆轉，中共快將控制全國。⁵⁰

⁴⁵ 趙元浩：〈宣傳與統戰相輔相成〉，頁45。

⁴⁶ 楊奇：〈復刊後的香港《華商報》〉，頁15-16；俞鯉庭：〈難忘的三年半編輯生涯〉，頁45。

⁴⁷ 司徒丙鶴：〈《華商報》與海外同胞血肉相連〉，載《華商報之路》，頁48-49；吳荻舟：〈版面內外〉，頁64；劉添梅、饒海珠：〈輝映猶在 業績尚存〉，頁27。根據吳荻舟，經《華商報》讀者版「先後安排回解放區工作、學習的不下千人」；他說：「『文革』中我為他們足足寫了幾十萬字的證明。」

⁴⁸ 司徒丙鶴：〈《華商報》與海外同胞血肉相連〉，頁49。

⁴⁹ 劉添梅、饒海珠：〈輝映猶在 業績尚存〉，頁27；楊奇：〈復刊後的香港《華商報》〉，頁15-16。

⁵⁰ 見《歷史、話舊、懷念》一書中以下文章：楊奇：〈新聞學院函授班始末〉，頁85-86；汪學勤：〈關於中國新聞函授學院〉，頁87；甄石續：〈憶新聞函授學院〉，頁88。

出版印刷

為《華商報》、《正報》及《群眾》做印刷、出版及發行工作的，是有利印務公司和新民主出版社。在行政上，《華商報》、有利印務公司和新民主出版社是統一管理的，設董事會、總經理(最初是饒彰風，後由薩空了接任)，黨內則由饒彰風統一負責；香港工委成立後，則統一歸報委領導。⁵¹

有利印務公司是《華商報》的印刷廠，早於1941年9、10月間，在中共的聯繫下，由《華商報》督印人、華比銀行華人經理鄧文田，以及南洋資本家陳嘉庚投資成立。香港淪陷期間印刷廠沒有受破壞，至《華商報》籌備復刊，就把廠由銅鑼灣搬到中環干諾道中123號，與《華商報》和新民主出版社集中在一起。⁵²除印刷《華商報》、《正報》和《群眾》週刊外，有利也接外來印件，又為一些與中共友好的「民主團體」排印報刊。⁵³有利於1947年初解僱原有技工，代之以一批經特別培訓的年輕工人。為了保持這個「工人隊伍的純潔和擴大」，公司成立職工會和黨支部，通過組織演講學習和唱革命歌曲等，加強對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⁵⁴此外，大部分員工亦參加一個「進步」的、以俱樂部形式成立的「印工業餘憩廬」，活動包括「文化學習、時事座談、歌詠等」。⁵⁵

《華商報》復刊時也創辦新民主出版社，作為報社圖書出版部。俟工委下面的報委成立後，《華商報》副編輯廖沫沙就被調任出版社主編，以後又增加了文委委員邵荃麟與廖作雙重領導，可見中共對它的重視。出版社最初向上海各「進步」出版社如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和開明書店購進大批書籍在港澳發售；繼而出版中共領導人的文章(包括一套單行本的《毛澤東選集》)、「解放區」的各種文獻(例如饒彰風編的《整風文叢》)、馬列主義書籍、青年讀物、南方作家的文藝作品(如黃谷柳的《蝦球傳》)等。在國共內戰初期，「解放區」對外貿易及出版工作較前活躍，新民主出版社也翻印了東北新華書店及煙台大眾書店的歷史、傳記，以及延安和「老解放區」的各種書籍。據說，從1946年1月到1949年10月結束為止，出版社一共編印新書224種，而光是《毛澤東選集》單行本就達一百萬冊以上。⁵⁶

⁵¹ 吳仲：〈回憶香港新民主出版社〉，載《白首記者話華商》，頁81-84。

⁵² 文琮：〈《華商報》與有利印務公司〉，載《白首記者話華商》，頁85-87；吳仲：〈回憶香港新民主出版社〉，頁81。

⁵³ 高建民：〈有利印務公司的歷史經驗〉，載《華商報之路》，頁71-72。

⁵⁴ 文琮：〈《華商報》與有利印務公司〉，頁85；高建民：〈有利印務公司的歷史經驗〉，頁71。

⁵⁵ 文琮：〈《華商報》與有利印務公司〉，頁85-87；高建民：〈有利印務公司的歷史經驗〉，頁72；陳景文：〈共同的目標把我們凝聚在一起〉，載《華商報之路》，頁108。

⁵⁶ 吳仲：〈回憶香港新民主出版社〉，頁81-84；吳仲、殷劭：〈淺論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兩個效益及其辯證關係〉，載《華商報之路》，頁68-70。

辦學

中共幹部在利用學校作為工作據點方面有豐富的經驗。早在抗戰前夕及抗戰初期，連貫就在香港的南方書院當教員，而先後在這裏任教的還有其他港澳工委的幹部，包括杜埃、饒彰風、楊康華、羅理實和抗戰時期廣東省委常委梁廣等。他們與創辦人潘健康很熟悉，實際上就已把學校當作黨的地下聯絡機關了。⁵⁷此外，中華中學似乎也是重要的中共據點。1940至1941年間，「文協」香港分會以「文通」的力量為主，辦了四期文藝講習班，最早兩期就是在堅道的中華中學辦的。⁵⁸同一時期，中共的新聞統戰機關中國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也辦了中國新聞學院，供在職青年進修，也是在中華中學上課的，足見這所中學與中共關係密切。⁵⁹

英國殖民地部檔案顯示，在國共內戰時期，中山縣有數個共軍進駐的游擊區，其將領歐初常來香港，在這裏維持一思想傳播基地，名為致用學校(譯名，原文Chi Yung)。⁶⁰不過，到了1946年初，中共已在一些華僑資本家的支持下，透過「民主人士」出面，辦了幾間中學，包括香島、漢華和培僑，標誌著統戰工作的成效和思想傳播基地的確立。⁶¹這些中學為不少幹部提供教師職位，以掩蔽其地下工作的身分，同時也使其生活有著落。譬如說，在1948年成立的工委下的統戰委員會，就曾安置其委員羅培元於1947年在培僑教書。在此之前，羅培元是在廣西做地下工作的，公開身分是《柳州日報》社長。⁶²當然，學校工作除了提供掩護及生活費之外，黨員也可以通過教學活動影響學生，尤其是「民主人士」的下一代，使統戰工作更深入和鞏固。⁶³

在中共設立的學校中，以具大學規格的達德學院最令人矚目。這不僅因為它規模大，教授有名氣，更因為它的學生來自各方，而且又開展了種種的黨務工作。光從

⁵⁷ 見《賢者不朽》，頁210。

⁵⁸ 《歷史的軌跡，1939-1950》，頁8。

⁵⁹ 見《歷史、話舊、懷念》一書中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主辦中國新聞學院招生簡章〉及落霞：〈新聞學院招考記〉、〈開學典禮〉、〈祝中國新聞學院〉，頁5，6，8，10。

⁶⁰ “Some Facts about the Actual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Chung Shan District”, Enclosure of Consulate-General to British Consulate in Macao, 28 Nov 1947, CO537/3720.

⁶¹ 楊子江：〈深切懷念連貫同志〉，載《賢者不朽》，頁82-86；又見同書，頁210。

⁶² 羅培元：〈你叫甚麼名字？——懷念引導我上統戰崗位的連貫同志〉，載《賢者不朽》，頁18-26；又見同書，頁212；另據1992年7月28日訪問所得。

⁶³ 見《賢者不朽》，頁212。連貫曾對在「進步學校」工作的人說：「統戰工作的圈子越大越好，連統戰對象的家屬、子女的工作都要認真做。比如說，你們這間學校的學生中，就有李濟深、翁照垣、李公樸和薩空了等許多民主人士的子女，別看他(她)們現在還是孩子，把他們教育好，就成為革命者了，將來能挑上革命的擔子！」

共產黨的分工架構來看，我們就知道達德的重要性：香港工委下設群委，專門負責群眾運動，而群委下面有青委、婦委、學委、校委和達德五條線，分別統籌青年、婦女、學生、學校(主要為有中共背景的學校)負責人和達德的組織工作。⁶⁴可見達德在地下黨的工作中，是相當重要的。

據曾協助籌建達德的中共地下黨員說，黨在香港的工作方針，是支持和配合國內的解放戰爭，不要影響香港的利益，故此不會在香港搞任何群眾活動，如勞工運動、學生運動等。在學校工作方面，黨要求達到的目標，是培養品學兼優的學生，爭取家長的信任，從而擴大對社會的影響。至於群委的工作，主要是在1946至1947年國內學運高潮期間，⁶⁵接收逃避國民黨追捕的共產黨學生，在港提供支援及訓練，然後再送返國內游擊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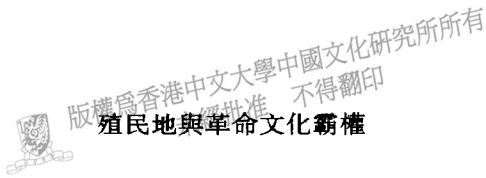
社群統戰活動

總的來說，中共在香港的文化機構發揮了宣傳國內革命的作用，以加強統戰工作，爭取支持者，從而建立中共作為領導者的合法地位，也為統一全國而訓練和吸收人才。在這方面，對南下避難的民主人士作進一步團結以至改造的工作，尤為急務。

1947年下半年，蔣介石對民主派進一步鎮壓。到了10月，國民黨宣布中國民主同盟(以下簡稱民盟)為非法團體。此舉無異將自由主義民主派完全排斥於主流政治之外，民主人士也被迫逃亡南走香港。較早來港的是因反蔣活動首當其衝的國民黨左派。如中國民主促進會(以下簡稱民促)中央領導人李濟深、蔡廷鍇、朱學範等在1946年秋和1947年初已陸續到港。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以下簡稱民聯)在1946年夏即派人在港建立組織，並出版《民潮》月刊。其常務幹事譚平山、朱蘊山、柳亞子等在1947年秋冬先後來港，民聯中央也隨之遷港。由老牌反蔣派「第三黨」改組而成的中國農工民主黨(以下簡稱農工)部分負責人如章伯鈞等則在1947年底秘密抵港，並將中央機關遷港。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後，沈鈞儒等先後秘密來港，與先來港的中委鄧初民等匯合。中國民主建國會(以下簡稱民建)及民促也在民盟解散後轉入地下。民建早在1947年7月已計劃開闢新活動點，由章乃器等赴港籌備。民促領導人馬敘倫等則在中共協助下，於1947年冬抵港。

⁶⁴ 據訪問所得。

⁶⁵ 在這段時期，國內各大城市接二連三發生了大規模的學運，主要的有：1945年底昆明的「一二·一」反內戰運動、1946年初廣州的反對召開政協運動、1947年初全國因美軍強姦學生沈崇而發動的反美運動，以及1947年中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關於這段時期的學生運動，可參考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chap. 3, pp. 42-94。



這些由1946至1947年間南來的小黨派，一方面受國民黨排斥，另一方面受中共協助，故剛來港時已由中間派轉為左派，如民促中央抵港時即宣布擁護共產黨。⁶⁶ 1948年1月2日，旅港各小黨派及文化界人士在金陵大酒家舉行的團拜聚會，中共代表方方等也有出席。⁶⁷ 在1948至1949年間，大批民主人士抵港時，香港分局的領導人方方、尹林平等便常與各小黨派領袖會面，動員他們響應中共的號召，投入反蔣介石的鬥爭。⁶⁸ 連貫、饒彰風等也常邀請民主黨派參加座談會和聚餐會。正如下文所詳述，他們也積極協助各小黨派在香港建立機構，發展組織。⁶⁹ 《華商報》也按照中共指示，組織座談會，邀請知名民主人士參加，並刊登座談紀要。⁷⁰ 由此可見，四十年代中的香港可說是中共的重要統戰基地。

事實上，中共在來港各小黨派的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民盟三中全會在籌備過程中，就得到中共中央和華南局方方、連貫、許滌新、章漢夫等領導人的大力幫忙。⁷¹ 民盟中央機關報《光明報》在香港的復刊，也得到中共的協助。⁷² 三中全會後身為中共黨員的周新民成了民盟代理秘書處主任。

匯集國民黨左派力量而在港成立的新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民革)也和中共有緊密關係。民革在籌組時，中共中央已向香港分局指出李濟深的重要作用，在香港分局協助下成立的民革遂以李氏為主席。⁷³ 民革成立大會所通過的〈成立宣言〉、〈告本黨同志書〉和〈行動綱領〉都曾徵求華南分局的意見。⁷⁴ 民革中央宣傳委

⁶⁶ 李鎮靖：〈關於李濟深在抗爭後期及解放戰爭時期活動的回憶〉，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40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93。

⁶⁷ 張軍民：《中國民主黨派史(新民主主義時期)》(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頁605。

⁶⁸ 蔣祖緣、方志欽(主編)：《簡明廣東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907；有關座談會的例子，見〈香港分局召開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座談會紀錄〉(1948年6月30日)，載葉金蓉等(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1989年)，頁162-69。

⁶⁹ 劉添梅：〈肝膽照人的饒彰風〉，載《廣東文史資料》第52輯(1987年)，頁95；《賢者不朽》，頁213-14；思慕：〈饒彰風與《華商報》〉，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回憶饒彰風》(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頁99；及趙元浩：〈沉痛追悼黨的好兒子饒彰風〉，載同書，頁133。

⁷⁰ 思慕：〈香港《華商報》的國際時事宣傳及其它——我進《華商報》的前後〉，載鍾紫(主編)：《香港報業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64-65。

⁷¹ 張軍民：《中國民主黨派史(新民主主義時期)》，頁641。

⁷² 陸詒：〈《光明報》在香港復刊記〉，載《香港報業春秋》，頁226-27。

⁷³ 盧荻：〈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李濟深的統戰工作〉，載《廣東黨史資料》第18輯，頁270。

⁷⁴ 朱學範：《我與民革四十年》(北京：團結出版社，1990年)，頁84。

員梅龔彬就是個身兼民促、民盟、中共三黨黨員身分的人物。而1948年9月，民革與上海遷港的《文匯報》共同出版的民革中央機關報，也由中共的潘漢年、宦鄉等給予大力協助。⁷⁵ 周恩來曾電方方、尹林平，並轉章漢夫，表達了他對該報香港版方針的意見。⁷⁶ 在民革辦報的過程中，梅氏等隨時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匯報。⁷⁷ 在夏衍、潘漢年等的指示下，該報以較溫和的中間偏左立場出現。1949年初，該報發生經濟困難時，上海的中共組織就發動由黨員管理的錢莊出資支援。⁷⁸

對於民革的成立和民盟領導機關的重建，中共自然極表歡迎。⁷⁹ 香港既為南來各小黨派提供了一個重整力量的空間，也為他們與中共的結合造就了機會。故他們在港所發表的聲明，大多與中共的立場一致，而他們所攻擊的對象，除了國民黨和蔣介石外，還包括支持國民黨的美國。1948年2月民革、民盟、救國會、農工、民促、民聯、致公等黨派在港聯合發表聲明，抗議美國增加對蔣介石的支援。1948年3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行憲國大」，在港各小黨派紛紛發表聲明聲討。到了6月，李濟深等又聯合發表《反美扶日宣言》，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復興。各黨還聯合香港各界人士成立了香港各僑團反對扶植日本工業復興運動大會。⁸⁰

可以說，中共在香港的社群統戰活動，是它在南下人士中建立革命文化霸權的主要工作。如前所述，為免驚動殖民地政府，中共不會在香港大搞工運、學運等群眾運動。廣義而言，它的宣傳對象除主要是海外華僑和國統區人民外，也包括部分港澳人士；但狹義而言，香港作為文化基地，其主要作用是安置來自國內的左派人士，以及為南下的民主派提供一個與中共合作的空間。到了1948年，中共在這些訪港人士中的領導地位已非常明顯。

⁷⁵ 張軍民：《中國民主黨派史（新民主主義時期）》，頁621；香港《文匯報》在1948年創刊時，由李濟深等任董事（不公開），梅龔彬等為社務委員，徐鑄成為總主筆，馬季良為總編輯。1949年初徐等北上參加新政協，報編輯部交金仲華主持。關於《文匯報》作為民革的機關報及其與中共的關係，見徐鑄成：〈香港《文匯報》創刊前後〉，載《香港報業春秋》，頁268-74；另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等（編）：《李濟深紀念文集》（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13；朱學範：《我與民革四十年》，頁172；〈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行動綱領〉，載于剛（主編）：《中國各民主黨派》（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頁31；香港達德學院福建校友會（編）：《情況交流》第36期。

⁷⁶ 《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715。

⁷⁷ 朱學範：《我與民革四十年》，頁174。

⁷⁸ 徐鑄成：〈香港《文匯報》創刊前後〉，頁271-74。

⁷⁹ 〈中共中央發言人評民盟三中全會及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宣言〉，《東北日報》，1948年3月8日。

⁸⁰ 張軍民：《中國民主黨派史（新民主主義時期）》，頁655-56。

四

一九四八年中共和民主人士在香港掀起了一個批判中間路線的浪潮，攻擊的矛頭指向國民黨和美國。這場批判象徵了民主黨派在意識形態上徹底背離中間路線而完全皈依革命陣營。⁸¹ 自此他們可說已完成革命化的過程，而中共在建立排他性的「文化霸權」的路上又邁進了一大步。

其實，1948年民主黨派在香港對中間路線的批判，是他們在中共領導下取得一致立場後對「國際第三方面勢力」的攻擊，針對的是當時國內和西方自由主義分子所重提的中間路線。當然，對中共而言，爭取中間派一直是他們的重要統戰策略。周恩來在1946年就說過：「民主鬥爭艱難曲折，居中間者，動搖到底，我們亦爭取到底。」⁸² 中共的目的是要把中間派納入親共陣營，故連貫在回憶中共協助民革成立時，強調當時他們向中間派指出「第三勢力」沒有出路。他說：「在那種複雜的情況下，我們主要協助他們進行磋商，用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來統一思想；同時也嚴肅地批判了所謂『第三勢力』的反動性，指出這條道路注定是沒有前途的。」⁸³ 1947年中共中央委員會在港成立支部。同年，新華社香港分社成立，大大提高了中共在港的文化活動能力。⁸⁴ 對民主派進行統戰，並領導他們批判中間路線等工作，遂得以全面開展。

然而，1948年的中間路線言論卻與當時因內戰形勢而求變的國民黨陣營及其支持者美國有微妙的關係。1948年1月，國民黨政學系的《大公報》連續發表了以「自由主義者的信念」、「國際第三方面勢力的抬頭」、「政黨、和平、填土工作」等為題的社論，鼓吹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聲稱「我們真想尋求一條新路」，並強調這條路線「絕對不是兩邊倒，是左右的長處兼收並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⁸⁵ 2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發表〈告中國人民書〉，呼籲「在中國目前面臨如此最嚴重之情勢，凡愛其國家者尤其曾受教育之愛國人士，似有一極大機會與責任，

⁸¹ 關於國共內戰前後中間派的動向，參見E.S.K. Fung, *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9–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s. 8–9。

⁸² 見1946年11月17日周恩來致郭沫若函，錄自邱錢牧：《中國民主黨派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頁340。

⁸³ 連貫：〈和衷共濟，振興中華〉，《團結報》，1985年11月5日。

⁸⁴ J.T.H. Tang, "World War to Cold War: Hong Kong's Future and Anglo-Chinese Interactions, 1941–55", in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1992*, edited by M. K. Ch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15–16.

⁸⁵ 〈社評：自由主義者的信念——關妥協、騎牆、中間路線〉，《大公報》（上海），1948年1月8日；參見〈社評：國際第三方面勢力的抬頭〉，《大公報》（上海），1948年1月16日；〈社評：政黨、和平、填土工作——論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大公報》（上海），1948年2月7日。

以群策群力研究何者為國家之問題」。並提出己見：「余以為此輩人士可組一新黨，而對政府作建設性之批評，亦可組成若干團體，以倡導若干有關政策之主張及進步之運動。」⁸⁶ 司徒雷登承認，為使美援能「得到最大效果」，美國人對「政府支持之下」的「進步運動」，「期待頗殷」。⁸⁷ 到了3月，被認為有美國洛克菲勒基金和宋子文資助的「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在北平成立，提出三十二條政治主張，認為「國內應有並列的政黨」，「政權的轉移應視選舉的結果而定」。在土地問題上，「規定私人佔地的最高限制」，將超過限額的部分收歸國有時，地主應獲「長期債券，以為補償」。⁸⁸ 他們在所出版的《新路周刊》上，展開了「蘇聯是否民主？」「用和平方法能否實現社會主義？」「現政府是否有改善的希望？」等問題的討論；提出「內政協調」、「外交協調」等主張，反對「施用暴力」。⁸⁹

對於這條中間路線，雲集香港的前中間派人士反成其大敵。他們既然已和中共取得一致立場，對於與國民黨和美國有密切關係的中間派，當然有戒心。回應國內《大公報》的社論、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的主張以及司徒雷登的言論，他們與中共輿論媒介迅即作出立場相當一致的批判。早在1948年初，《正報》、《群眾》、《華商報》等已率先批判《大公報》、「第三條道路」及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等的自由分子言論。⁹⁰ 1948年2月，民盟與其他小黨派及居港文化界人士百多人舉行了批判中間路線集會。會上沈鈞儒說：「新第三方面……如張君勱之流，以得做美國尾巴自豪，實在是極可恥的事。」又說：「過去一些所標榜『中間路線』，現已走不通。除參加革命或反革命，即無路可走。」⁹¹ 此說等於重申民盟已由中間派轉為「革命派」。民盟的領導層亦在港舉

⁸⁶ 王德夫、樓開炤：《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歷史研究（民主革命時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123。

⁸⁷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3573, Far Eastern Series 30 (Division of Publications,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Aug. 1949), chap. 6; see also "Doc. 8: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 Feb. 23, 1948," in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edited by Kenneth W. Rea and John C. Brewe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1), pp. 172-73.

⁸⁸ 《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的初步主張》，轉引自李燕奇：《走向合作的歷程——中共與民主黨派關係的形成及演變》（北京：華文出版社，1996年），頁191。

⁸⁹ 《新路周刊》第1卷第1期（1948年5月15日）。

⁹⁰ 李岱青：〈關於「第三條道路」的破產〉，《正報》第2年22期（1948年）；懷湘：〈撕破偽「自由分子」的面具〉，《群眾》第2卷第14期（1948年）；卓芸：〈大公報的「中間路線」〉，《群眾》第2卷第3期（1948年）；胡繩：〈為誰「填土」？為誰「工作」？——斥大公報關於所謂「自由主義」的言論——〉，《華商報》，1948年2月22日。

⁹¹ 〈沈鈞儒章伯鈞在民盟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招待民主人士談話〉，載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頁408。



行記者招待會，聲明「民盟在自己的政治路線上所應該進行的工作，必須在真民主真和平之中認清敵友，在是非之間，民主與反民主之間沒有『超然的』或者『中間路線』的存在可能」。⁹² 各黨負責人和文化界人士也分別對記者發表談話，指斥「蔣美和談陰謀」。⁹³

3月初他們又在《華商報》報社舉行座談會，繼續猛烈抨擊自由主義運動和中間路線，用上了不少中共習用的詞匯。如鄧初民稱中間路線為「中小資產階級右傾的幻想」；譚平山說要幫助知識分子弄清自由的真正意義，要「爭取全中國人民的集體自由，然後我們每個人的個人自由才有保證」。作家邵荃麟指「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及其所發動的「自由主義運動」是美國國務院「設計」、司徒雷登、魏德邁等「導演」、宋子文等「幫助導演」的，「演員」是胡適和政學系《大公報》等大大小小的「自由主義者」，這場「自由主義運動……實質只是一種政治陰謀」。⁹⁴

這次座談會可說是由中間派轉為左派的反國民黨力量在香港抵制國內剛抬頭的「新第三方面」勢力的一系列活動的重要項目。正如當年的一篇評論性文章〈自由主義運動的批判在香港〉指出，這次立場一致的批判，「足可以代表香港的左翼黨派和左翼文化界對國內這一運動的看法了。這也就是『新第三方面』或『中間路線』或『自由主義運動』在香港所遇到的重大的打擊」。可說「新第三方面勢力」剛抬頭就遭到當時雲集香港的各小黨派的抵制。而中間路線的呼籲，「在聲勢浩大的左翼力量打擊之下是顯得非常微弱無力的」。⁹⁵

《華商報》又請各人繼續撰寫批評文章，並開設「社會經濟研究會的批判」專欄，由馬敘倫、鄧初民、侯外廬、曾昭掄、郭沫若、翦伯贊等發表文章，駁斥「新中間路線」的立論。⁹⁶ 1948年內該報陸續刊登了以個人名義和黨派名義發表的批判文章，成了抨擊自由主義運動的重要園地。譚平山在該報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鞏固統一戰線，粉碎和平陰謀〉，除指出自由分子中間路線者「對美帝有幻想」、企圖改善蔣介石「盡失民心」的孤立狀態外，更道出這次批判所能進一步發揮的作用，他說：「除了揭露和打擊之外，還需要整頓我們的革命隊伍，清除一班苟安妥協的動搖分子，鞏固革命的統一戰線，把革命鬥爭進行到底。」⁹⁷

⁹² 〈沈鈞儒章伯鈞等在民盟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招待記者談話〉，載《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頁403。

⁹³ 《華商報》，1948年2月26日。

⁹⁴ 鄧初民：〈「自由主義」與「和談」是整個陰謀的兩面〉；譚平山：〈爭取全民集體自由個人自由才有保證〉；邵荃麟：〈所謂「自由主義運動」不是思想運動而是政治陰謀〉，見〈座談紀錄：蔣美「和談」陰謀與「自由主義」運動〉，《華商報》，1948年3月14日。

⁹⁵ 胡光：〈自由主義運動的批判在香港〉，《國訊》第456期（1948年），頁13。

⁹⁶ 〈「社經研究會」批判〉（上）（下），《華商報》，1948年3月15-16日。

⁹⁷ 《華商報》，1948年3月5-6日。

同時期，居港各小黨派已響應中共的「五一號召」，為擴大和鞏固「革命統一戰線」以推翻國民黨統治，為「新政協」的召開作準備，展開了一場「新政協運動」，並在這場運動中，「批評糊塗認識」，⁹⁸ 再追擊自由主義和中間路線。民盟在港的機關報《光明報》先後發表了〈自由主義的批判〉、⁹⁹ 〈揭開「偽自由主義者」集團的畫皮〉、¹⁰⁰ 〈偽自由分子與自由分子的兩條道路〉、〈我們對自由主義的態度〉、〈答施復亮先生論「中間路線」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等文章。¹⁰¹ 民聯在其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中也指出，「凡是堅決地站在民主統一戰線方面者，凡是希望今後『新政協』順利成功者，不獨不應該有著絲毫『第三條道路』的幻想，而且應該積極起來揭露這種『第三條道路』的陰謀」。¹⁰² 民促、民革等也紛紛發表支持新政協批判「新第三方面」的文章，處處顯示出在港各小黨派已和中共取得完全的共識，他們可說全屬同一陣營。正如馬敘倫所說：「上次政協是反民主的反動集團做主體，而偽民主派也參加了，這次是民主陣線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體，而中國共產黨是當然的領導者。」¹⁰³ 身為共產黨人的喬冠華也肯定地說，當時的「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大多已「斷然向左了」。¹⁰⁴

Gramsci指出，為建立文化霸權而進行的鬥爭最初要在大眾傳播和教育中採道德和哲學論證的形式。¹⁰⁵ 1948至1949年間在香港的一場對中間路線的批判可說以論證的形式發揮了統整「革命陣營」的作用。透過對中間路線的批判，旅港各小黨派迅速完成革命化的過程，肯定「集體自由」的重要性和「民主集中制」的優越性。事實證明這種建立「革命文化霸權」的方法非常有效。自1948年5月1日中共發出「五一號召」，至1949年9月在北平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大批民主人士陸續從香港北上響應號召，參加新政協。到了中共建國前夕，原來南下香港的小黨派代表、左派青年、知識分子等在經歷進一步統戰的過程後，幾乎全數北上，為新政權服務。當然，北

⁹⁸ 張軍民：《中國民主黨派史（新民主主義時期）》，頁679。

⁹⁹ 黃藥眠：〈自由主義的批判〉，《光明報》新1卷1期（1948年）。

¹⁰⁰ 孟南：〈揭開「偽自由主義者」集團的畫皮〉，《光明報》新1卷2期（1948年）。

¹⁰¹ 〈社論：我們對自由主義的態度〉，李伯球：〈偽自由分子與自由分子的兩條道路〉，鄧初民：〈答施復亮先生論「中間路線」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光明報》新1卷3期（1948年）。

¹⁰² 張軍民：《中國民主黨派史（新民主主義時期）》，頁680。

¹⁰³ 馬敘倫：〈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後〉，載《馬敘倫政論文選》（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頁348。

¹⁰⁴ 于懷：〈追擊中間路線〉，載《統一戰線諸問題》（香港：自由世界出版社，1948年）。關於民主派的轉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影響，見葉漢明：〈香港與四十年代中國民主運動的邊緣化〉，《史叢》第3期（1998年），頁323-56。

¹⁰⁵ Boccock, *Hegemony*, p. 76.

上人士還包括來自港澳及海外的愛國人士，他們也在香港受到革命的感召。可以說，中共這個以革命為共同語言的共同體在文化領導權方面已取得具體成果。¹⁰⁶

五

在短短三數年間，香港殖民地的特殊政治生態既為受國民黨排斥的民主派提供一個重整力量的空間，也給予中共在國內的軍事戰線外，得以再開闢一條文化統一戰線的機會。造就這些發展條件的，除了是香港與內地接壤的地利之便外，更重要是香港的言論自由空間。關於這點，幾位在港工作的資深幹部、報人等都在其回憶錄中提及。¹⁰⁷

然而，香港的自由空間卻在極其短促的期間內迅速收窄。港英當局在1948年已加緊注視左派人士在香港的政治活動。當時的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在其報告中指出，有充分證據顯示，香港已成為東南亞共產黨交換信息、資金和宣傳資料的中心。香港的言論自由和准許中國人自由入口的政策，使它成為中國政黨的極佳避難所，也為中共提供了滲透各黨的良機。¹⁰⁸ 港英政府也掌握了來港小黨派已由中間派轉為左派的消息，也知悉民盟、民革等與中共的密切連繫。¹⁰⁹ 一些內部文件顯示，港府正密切注視李濟深等「民主」人士，懷疑他們在為中共作掩護，用民主人士的名義為中共開設駐港機關。¹¹⁰ 李濟深於1948年1月在港領導南下的國民黨中反蔣力量成立民革時，葛量洪已計劃抑制他的行動。¹¹¹ 當有情報顯示中共派連貫從上海到港，與李濟深和其他民革及民盟領袖共商合作大計時，葛量洪已準備隨時禁制他們的行動。¹¹² 為監視李氏，政治部派了兩個特工住在半山區干德道李宅對面。

¹⁰⁶ 參考有關discourse community概念的論述如D. E. Apter and T.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¹⁰⁷ 吳仲、殷劭：〈淺論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兩個效益及其辯證關係〉，頁68；趙元浩：〈宣傳與統戰相輔相成〉，頁44-47，111；楊奇、梁洪浩：〈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港報港辦——香港《華商報》的一條主要經驗〉，載《華商報之路》，頁33-41。

¹⁰⁸ Extract from Savingram No. 27 Secret dated 26th Apr., 1948 from Governor, Hong Ko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CO537/3722.

¹⁰⁹ "Dissident Chinese Political Elements in Hong Kong," 1948, CO537/3726.

¹¹⁰ Governor A. G. Grantham to Commissioner-General, British Embassy, Nanking, 2nd Apr., 1949, FO371/75780.

¹¹¹ A. G. Grantham, Governor to Ambassador, British Embassy, Nanking, 16th Jan., 1948, CO537/3722.

¹¹² Governor to Arthur Creech Jone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11th Aug, 1948, CO537/3722.

1948年底至1949年初，民主人士紛紛離港北上時，港府政治部的負責人便經常到李宅聊天，企圖阻止李氏成行。結果，李氏須在中共秘密安排下離港。¹¹³

事實上，隨著中國內戰形勢的發展，英國已估計到中共可能奪得政權。殖民地部及外交部在1948年中已要求港督定期呈交有關共黨活動的情報。¹¹⁴ 香港政府雖容許中共在港活動，但和國民黨一樣，中共和各小黨派都成為港府監視的對象。《正報》、《華商報》等有中共背景的報紙常受政治部的巡查。¹¹⁵ 曾任《華商報》總編輯的劉思慕就提及，香港政治部一位姓黃的高級人員不時登門造訪報社負責人，每次逗留約一小時，查詢的內容包括見報的旅港民主人士行蹤、近況等。香港當局也曾控告報社「違章建築」、「誹謗」等。¹¹⁶ 政治部也常派人巡看《正報》所辦的書刊門市部。1948年香港總督府官員更帶人沒收《正報》發行的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單行本，並逮捕門市部人員，後又搜查該報在堅道的編輯部。¹¹⁷ 此外，《群眾》周刊的負責人每隔月餘便被港府盤問一次，其住所周圍也常出現便衣特務。¹¹⁸

到了1948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國內被中共佔領的地區愈多，香港政府對中共活動的抑制也愈強。1949年4月發生「紫水晶號事件」，中共與英國的關係一度緊張，英國隨即增加在港駐軍，而港府亦對在港的中共活動採取較強硬的態度。¹¹⁹ 有關行動包括搜查中共的機關和黨員如許滌新、連貫、方方等的住所。¹²⁰ 從這些行動中所獲得的資料，進一步證明英國和香港政府對中共的疑慮並非杞人憂天。根據英國外交部從搜得的文件所作出的結論，中共的教條主義傾向極強，有強固的意識形態和

-
- ¹¹³ 周淑真：《1949飄搖港島》，頁176-78；楊奇：《憶復刊後的香港《華商報》》，頁194-95；姜平、羅克祥：《李濟深傳》（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年），頁234-40。
- ¹¹⁴ J. I. Paskin, Colonial Office to Governor, 27th Apr., 1948, CO537/3731; Paskin to Governor, 8th May, 1948, CO537/3731.
- ¹¹⁵ 陳平：〈《正報》在香港出版發行情況的回憶〉，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21輯（1980年），頁144-45；思慕：〈香港《華商報》的國際時事宣傳及其它〉，頁182。
- ¹¹⁶ 思慕：〈香港《華商報》的國際時事宣傳及其它〉，頁181-82。
- ¹¹⁷ 陳平：〈《正報》在香港出版發行情況的回憶〉，頁144-45。
- ¹¹⁸ 林默涵（口述）、王曉吟（記錄）：〈《群眾》周刊在香港的奮鬥〉，載《廣東文史資料》第66輯（1991年），頁152。
- ¹¹⁹ 1949年4月，英國軍艦紫水晶號由上海駛往南京途中，被進駐長江北岸的中共軍隊開砲打中，船員受傷，軍艦擱淺。南京英國使館一位三等秘書尤德（後來在八十年代中葉，他以香港港督的身分參與中英之間有關香港前途的談判）從中斡旋，期間紫水晶號亦逃離險境。見Tang, "World War to Cold War," p. 114。
- ¹²⁰ 夏衍：〈白頭記者話當年〉，頁7；Outward 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to Hong Kong (Sir A. Grantham), 17th Mar., 1949, CO537/4829；《人民日報》，1949年6月23日。

組織，與歐洲共產黨相比，可謂不遑多讓。¹²¹ 中共非常重視黨員素質的純正，並不斷進行整風運動。外交部的報告直接引錄港府所得的中共文件，指出中共對統戰對象常存戒心，一方面要和對方交朋友，另一方面又要慎防受到「污染」，並強調交朋友的目的是為了改造對方。他們又非常重視自己的正統性，始終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無論其他黨派多民主，都不會被容納，除非他們完全認同共產黨。報告又指出，中共文件在提到統一戰線時，清楚表示他們與其他團體的合作只屬暫時措施。在大量提及李濟深和蔡廷鍇的資料中，中共的語調輕蔑，顯然只視之為工具，也對民盟和民革冷嘲熱諷。¹²²

從英國官員對所蒐得的中共文件的理解看來，他們要求港府進一步抑制中共在港的活動，實屬意料中事。他們認為有資料顯示中共可能利用香港作為華南和東南亞的宣傳中心，香港甚至會成為亞洲、歐洲和美洲共黨的中心。如為短暫安寧而繼續容忍其活動，只會付出將來產生更大麻煩的代價。事實上，港府自1948年12月展開一連串搜查行動後，已表示再難容忍中共在港活動，故自1948年底至1949年中的各項有關立法、封校、驅逐政治人物出境等行動，就是在英國和港府雙方取得共識下而進行的。¹²³ 1948年10月，港府制訂了《公安條例》，規定「煽動騷亂者」必須保證不再搞事。¹²⁴ 11月，港督請示殖民地部，要求修訂教育條例，俾教育署長有權對付有問題的學校和老師。港督又要求恢復《非法罷工及關廠條例》，俾港府易於對抗中共取得政權後對香港教育界和勞工界的宣傳活動。¹²⁵ 1949年2月，港督會同行政局就運用1948年末港府所制訂的《教育(第二號)修正條例》，以「維護公眾利益」為理由，封閉中共與民主黨派合辦的達德學院。¹²⁶ 港督又制訂了《人民入境統制條例》，管制

¹²¹ Cabinet Paper entitled "The Situation in China," Memo b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4th Mar., 1949, CO537/4829.

¹²² Appendix to Cabinet Paper entitled "The Situation in China," Memo b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4th Mar., 1949, CO531/4829; "Dissident Chinese Political Elements in Hong Kong."

¹²³ Extract from Secret Savingram No. 26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ated 12th Feb., 1949, Outward 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to Hong Kong (Sir A. Grantham) sent 17th Mar., 1949, CO537/4829.

¹²⁴ 余繩武、劉蜀永：《20世紀的香港》，頁187。

¹²⁵ Telegram, Governor to Secretary to State for the Colonies, 30th Nov., 1948, CO537/3729.

¹²⁶ 有關達德學院封校的決定，見Extract from Secret Savingram No. 26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ated 12th Feb., 1949, CO537/3729; "Appendix: Chinese Communists," Cabinet Paper entitled "The Situation in China," Memo by Secretary of Colonies for Foreign Affairs to Foreign Office, 4th Mar., 1949, CO537/4829; 另參見Anthony Sweeting, *A Phoenix Transform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in Post-War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04。



非本港土生人士來港、離港及在港內的活動，禁止有「鼓動叛亂或擾亂公共安寧的嫌疑者」入境。年中又制訂了《社團條例》，規定香港一切社團均須註冊。¹²⁷ 港督向英國提交條例草案時，明確指出該例旨在取締與外地政治團體有關的社團，更強調中共執政後會給香港帶來更大難題。民盟、民革等政黨已被滲透，故須立例抑制中共對學校、工會、歌詠團和劇社等的顛覆性影響。受條例影響的包括國民黨、民盟、民革及其他小黨派。中共在港並非公開組織，但掩護它的團體已成為港府取締的目標，這樣中共也間接受到抑制。¹²⁸ 港府又計劃在教育署外成立特別部門，定出抵制中共政治教育的策略，並取消涉嫌受中共滲透的學校的津貼。¹²⁹ 同年8月，香港立法局通過「人口登記條例」、「驅逐不良分子出境條例」等法例，執行者可隨時搜查居民的身體和住所、扣留或拘捕他們、將不受欢迎人物驅逐出境等。¹³⁰ 可以說，在中共建國前夕，港英當局已在立法上作出準備，加強對香港社會的控制。這些「先發制人」的措施，一方面可能由於二十多年前省港大罷工期間的大規模群眾動員令港府一直存有戒心；¹³¹ 另一方面，港府亦有社會治安管理的考慮，擔心共產黨得勢後會有大量政治難民來港，帶來嚴重的社會經濟後果。

由此可見，四十年代香港為各方力量所提供的相對自由的發展空間，只能維持一段短暫時期。在這段短促的日子中，殖民地的微妙政治生態曾為來自國內的異見人士提供一個類似租界的環境。由於多數租界容許居民在言論、集會、結社、罷工等方面享有較多自由，反政府人士自十九世紀末起便常以租界為其活動據點或避難所。及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租界就成為中共反國民黨的宣傳基地。不過，租界當局也常應中國官府的要求，鎮壓域內的革命力量。¹³² 香港的「類租界環境」中的政治氣候也和租界一樣不穩定。¹³³ 殖民地政府在1948至1949年間的異動，足以顯示香港

¹²⁷ 余繩武、劉蜀永：《20世紀的香港》，頁187。

¹²⁸ Governor to Arthur Creech Jones, 8th Apr., 1949, CO537/4835.

¹²⁹ Education Department, Hong Kong to C.W.M. Cox, Educational Adviser, Colonial Office, 20th Oct., 1949, CO537/3721.

¹³⁰ 余繩武、劉蜀永：《20世紀的香港》，頁187。

¹³¹ M. K. Chan, "Hong Kong in Sino-British Conflict: Mass Mobilization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1912-26," in Chan, *Precarious Balance*, pp. 27-58.

¹³²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218-26；參見吳圳義（編）：《上海租界問題》（台北：正中書局，1981年），第四編。

¹³³ 香港政府在二、三十年代對境內的中共黨員也有多次搜捕行動，見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Hong Kong, 1921-1936* (London: C. Hurst and Co., 1999); Hon-ming Yip, "Book Review: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Hong Kong, 1921-1936*," *China Journal* 45 (2001), pp. 269-70。

的自由空間的短暫飄忽。然而，中共卻能在短期內迅速進行文化統戰工作，在南下人士中建立領導權，這實因它深諳此類環境，故通曉利用之道。

六

就在這段極短促的日子中，中共憑其經驗，充分利用殖民地的「類租界」特殊空間，迅速進行文化統戰工作，加強民主人士對革命解放事業的認同，為自己的領導權奠定道德基礎。到了1948年底，中共在南下香港的人士中已穩握文化霸權，而國共內戰的形勢又趨明朗，香港分局便積極準備安排把在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其他知名人士送往東北及華北「解放區」，以便參加翌年舉行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香港分局內有一個專門領導小組，負責聯繫及護送有關人士北上。《華商報》亦組織了一個班子，分別約見北上人士，通過生意關係安排交通，把大批文化人及知識青年，連同大量物資運送到剛落入中共手中的天津去。也通過地下交通站，把知識青年送到廣東游擊區。¹³⁴ 在中共建國前夕，《華商報》也成為策動國民黨軍政官員投向共軍的據點、動員國民黨財貿機構員工「護產起義」及動員資本企業家回內地復業的工作站。¹³⁵ 為配合香港青年到華南「解放區」工作，該報副刊也發表文章，討論回國的思想準備問題。¹³⁶ 《華商報》另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計劃在中共佔領廣州後協助南下的新聞幹部創辦一份華南分局機關報，後更要動員所有員工——包括《華商報》、有利印務公司和新民主出版社的員工——到廣州，協助創辦《南方日報》。¹³⁷ 中共控制廣州後，新民主出版社更負責開設廣州新華書店。¹³⁸

總的來說，香港在1945至1949年間確是中共部署奪取全國政權的一個重要基地，而這個基地主要是文化基地，其基礎早已在抗戰初期奠定。四十年代後期，國民黨對左翼文化活動的鎮壓令中共的文化戰線南移。香港在一段短暫的日子內迅速成為左派分子辦報、出版、印刷、辦學和進行宣傳教育的據點。在這個文化基地上，中共更對南下的民主人士作進一步統戰工作，使他們服膺其領導，以統整革命隊伍，建立文化霸權。這些在短短三數年間完成的文化工作確能支援國內的革命事業，並為中共控制廣東及全國作好準備。當時所掩護、培訓和吸收的人才在中共建國後即

¹³⁴ 楊奇：〈復刊後的香港《華商報》〉，頁17。

¹³⁵ 吳荻舟：〈版面內外〉，頁65；劉添梅、饒海珠：〈輝映猶在 業績尚存〉，頁27。這些財貿機構包括福省銀行和招商局。

¹³⁶ 華嘉：〈憶香港《華商報》及其副刊〉，載《白首記者話華商》，頁49-56。

¹³⁷ 楊奇：〈從《華商報》到《南方日報》——關於創辦華南分局機關報的準備工作〉，載《華商報之路》，頁115。

¹³⁸ 吳仲：〈回憶香港新民主出版社〉，頁84。

葉漢明 蔡寶瓊 得翻印
未經批准

可立時作出貢獻。事實上，原來南下香港避難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進步學生等在接受進一步統戰工作後，幾乎全數在中共建國前夕北上，為新政權效力。和他們一起回國的除了原來南下的中共幹部外，還包括部分港澳及旅港的海外愛國人士。這一大批北上人士都在香港參與或接觸過中共文化戰線的工作。他們的北上行動也印證了這些工作的顯著成效。


這批北上人士中有大量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菁英，他們的左傾和革命化，肯定大大加強了革命陣營的合法地位。他們與中共所聯成的一股批判國民黨的道德力量，當對廣大群眾有一定的影響力。正如Gramsci所說，在奪取「文化霸權」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的作用是絕對重要的。因為奪取和保持領導權主要是教育的事情。他又提出「有機知識分子」的觀念。所謂「有機知識分子」，即與革命力量有聯繫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爭取「文化霸權」的鬥爭中，能一方面使群眾獲得批判性的思想意識；另一方面，也保證了廣大人民群眾自覺自願地同意革命黨集團的原則，承認其領導地位和威信。有了這種知識分子，就可以建立一個知識界的道德集團。這個集團不僅在政治上使知識分子小集團的智性進步成為可能，而且可以使民智進步成為可能。¹³⁹

的確，革命黨以及作為其領袖的知識分子對文化霸權的建立有極大作用，他們能維持「整個社會集團意識形態上的統一，而這種意識形態又用來鞏固和統一該社會集團」。¹⁴⁰ 革命知識分子是引領群眾皈依革命力量的重要媒介，他們在奪權前就得將其世界觀向大眾灌輸，並爭取其他集團的認同，令社會整體在一個嶄新的文化秩序下重新整合。¹⁴¹ 這正是中共文化戰線工作的目的，而四十年代後期左派分子在香港利用辦報刊、出版印刷、教育、進行社群統戰等文化手段擴大、整合革命陣營的活動，實是中共文化工作整體的一個有機部分。事實上，這些工作確能配合中共的解放大業，他們的統戰對象大都在1948至1949年間北上效忠中共政權，為中共的奪權作出貢獻。他們不僅認同了中共的解放事業，並認可其領導權，他們的立場和所發揮的影響力不啻是中共建立革命文化霸權的結果。當毛澤東所稱的「革命文化」成為統一性的政治文化後，在這種革命文化的氛圍下，共產主義革命理想的感召力就能令中共的革命解放事業具道德性，從而使其領導權的合法性得以鞏固。四十年代後期中共在香港所致力，正是以「革命文化」整合南下人士及其他支持力量，以強化共產黨政治領導權的合法性，為奪取國內政權作好準備的工作。

¹³⁹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p. 6, 12, 15, 16, 18, 20, 60, 330, 332–33.

¹⁴⁰ *Ibid.*, p. 328.

¹⁴¹ Williams, "The Concept of 'Egemonia'," pp. 586–87; B. Fontana, *Hegemony and Power: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ramsci and Machiavell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150; J. Femia, "Hegemony and Consciousness in the Thought of Antonio Gramsci," *Political Studies* 23:1 (1975), p. 35.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殖民地與革命文化霸權

215

正如Gramsci所說，文化霸權是奪權和執政的條件，建立文化霸權的工作既為中共奪權創造條件，也預示了中共執政後「革命文化」的持續魅力，這也許是毛澤東「繼續革命」論產生的條件吧。¹⁴² 此外，革命文化霸權的後遺症是思想的一元化，¹⁴³ 其深遠影響，則須從中共建國後思想改造運動史的脈絡來作進一步檢討。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¹⁴² Gramsci本人卻批判「不斷革命」論，見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 243。

¹⁴³ 這方面的反思內容，也可包括延安整風所帶來的思想定於一尊的後果。

The Colony and the Hegemony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in the Late 1940s

(A Summary)

Hon-ming Yip Po-king Choi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eve of the civil war between the Communists and the Nationalists to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g Ko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t its latter stage, especially on the cultural fronts. In this sense, Hong Kong can be called the logistics bas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t that time, the Nanjing government's further suppression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leftist activities in mainland China drove a large number of intellectuals, democrats as well as leftists, members of minor parties, radical students and youths, and underground Communists to Hong Kong. The "push" force from the north and the subtle 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colony worked to hold this group of people together in this city, where they took shelter temporarily. It was in this special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text that the revolutionaries wasted no time in expanding their work on the cultural fronts, running newspapers, schools, publishing companies as well as printing houses, and undertaking united-front activities. On the one hand, they continued to reprove the Guomindang and launched a campaign to criticize the "middle-of-the-roaders" who had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 third force, hoping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Communists and the Nationalis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munists strove to build a united front with the minor parties stranded in Hong Kong and took further steps to radicalize these democrats in order to expand and consolidate the revolutionary camp. As a result, almost all of these democrats turned supporters of the Communists returned to mainland China to serve the new regime established in 1949. In this regar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de a big stride on the road of struggle for cultural leadership.

A. Gramsci's concept of "hegemony" and Mao Zedong's idea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are referred to in the analysis of the events outlined above. Gramsci, the Italian Marxist, stressed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primary importance of culture and ideology in political leadership. For him, "hegemony" meant political leadership based on the consent of the led, a consent secured through cultural means of diffus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view of the ruling class. For Mao and Chinese Communists who emphasized the cultural fronts, as much as the military fronts,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cultural work was crucial in establishing a unified political culture with revolution as its core. In this sense, the hegemony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signified the key to the legitima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for Mao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at Hong Kong witnessed in the late 1940s were the various activities undertaken by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to establish the hegemony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among Chinese political refugees who took sanctuary in the colony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he Colony and the Hegemony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217

temporarily before returning to the mainland as supporters of the revolution. This effort as a part of the Communists' general cultural work and united-front scheme contributed to the prepar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 its seizure of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